

胡适评传

章清／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OPHAI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趙景初題



胡适评传

章清／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國學大師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评传 / 章清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5500-1194-6

I. ①胡… II. ①章… III. ①胡适 (1891 ~ 1962) - 评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186号

胡适评传

章 清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统 筹	毛军英
责任编辑	张 越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22.25
版 次	1992年8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94-6
定 价	37.5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3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大师丛书》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兴	石峻	任继愈	刘桂生	汤一介
阴法鲁	张岱年	季美林	周一良	庞朴
赵朴初	姜义华	龚书铎	戴文葆	戴逸

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

桂晓风	熊向东	刘国藏	邓光东	周榕芳
朱焕添	王志斋	范卫平	关小群	钱宏
彭开天	傅伟中	李晃生	朱光甫	毛军英
尹飞舟	赵焜森	刘义林	董士伟	王守常
方鸣	钱文忠	傅修延	陈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赵丽雅	李晓岗	陈娟	黄卓越
陈骏涛	刘烜	魏漫伦	刘庆生	

丛书封面题签	赵朴初
丛书总体编辑	钱宏
丛书肖像木刻	颜仲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



胡适
评传

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

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孳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

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胡适
评传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大师”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

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008



胡适
评传

序

姜义华

提到胡适，人们常常将他同“全盘西化论”及民族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学大师丛书》选题中竟然将胡适列入，不啻石破天惊之举。但也正是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丛书组编者对国学及国学大师的识见很有新意，较之往昔习惯性的用法更为科学；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组编者对胡适在国学方面的贡献确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

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国学常常等同于古代经史典籍的辑集整理，及文字音韵、典章名物的训诂、考订、诠释。国学大师，通常即指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的一些大家。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和孙中山、章太炎、刘光汉、柳亚子等一大批先行者，筚路蓝缕，以勇于怀疑的精神和犀利的批判态度，动摇了传统经学、理学、史学、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融合以道、法、释诸家学说而形成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禁锢，开始了用新的概念、新的架构、新的方法来对中国古代经学、诸子学、玄学、佛学、理学、史学、文学进行清理、研究，使之得到新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给中国新文化提供了

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注入了极为强大的内在活力。这一切算不算中国的国学，算不算中国国学新的发展，算不算赋予了中国国学以新的生命？返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除去继承性一面之外，更重要的，恰恰是发展批判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精神，思想方面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文学方面从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传奇、小说，没有积极而自觉的扬弃，就没有这一切。古代如此，近代现代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什么到了20世纪，就非得要将新文化的创造，包括传统文化资料的重新清理、扬弃，摒之于国学大门之外呢？明乎此，对胡适和国学发展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胡适是在康有为、章太炎等前辈学者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些前辈思想家所开始的清理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命新发展这一工作的继续和深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方面，鲜明地树起批判的旗帜。刊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的《新思潮的意义》，是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纲领性文献。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①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推动思想文化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精神。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大批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精神。胡适在这里将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明确提了出来，并很具体地要求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训、行为与信仰，都要重新估定，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范围扩大到了前辈思想家们所未涉足的许多较为深层的领域，特别是民间文化、社会文化到大众文化、俗文化领域。这篇文章列举了当时新思潮所关注的一些热门问题，如孔教问题、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宗教问题、教育改良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等，胡适本人都曾积极参与、重新清理。其中孔教、礼教等问题动摇旧思想、旧道德根柢；女子、贞操、婚姻、父子等问题比较全面地反省了传统的父家长制的家族伦理宗法制度，这正是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文学改革、国语统一、教育改良、戏剧改良等问题，注目于社会大众，第一次将普通的民众从迷信、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使命提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评判的或批判的态度的积极运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全线更加有力地展开。

与此相联系的，是胡适要求对中国古代文化作真诚的反省，认为这种清醒的反省方才是建立民族信心的唯一基础。1934年5月至6月胡适撰写的论“信心与反省”的三篇论文，清楚地说明了他这方面的主要观点。

胡适认为，评判，所针对的主要是个别的具体问题；而反省，所要求的则是在进行了大量的评判后，综合评判的各种结果，充分了解其弱点，好有效地进行扬弃，方能正确地用以指导现今的实践。反省，当时集中在如何正确总结中国人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的情状这样一些问题上。其时，在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各种报刊上，最时髦的是诅咒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第6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6页。



新思潮使人欲横流、人禽无别，痛惜今不如昔，将中国的古代文明描绘为由美德造成的黄金世界，这些言论同当政的领袖们祀孔读经的言行互相呼应，大有完全否定或压倒新文化运动之势。正是面对这一形势，胡适将反省提到了最突出的地位。他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灭罪。”^①对中国旧思想、旧观念反省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②“我以为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自认罪孽深重，方才肯下决心去消除罪愆。”^③他认为，中国今日之大患就是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只有真诚的愧耻才能引起向上的努力，挑起拨乱反正的担子。

正如胡适本人所预料到的，他的这些论点很不合时宜，触犯忌讳，引起严厉的抗议。当时及其后数十年，他都常常因这些论点而被指责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代表。胡适所倡导的评判与反省确有弱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评判简化为重新评定是与非、好与坏，这是一种经验主义、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足以反映历史运动自身的曲折性、复杂性，将历史发展的扬弃过程简单化、直线化，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甚至可以说所有事物，其实都是集是与非、好与坏于一身。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坏中有好，好中有坏；昨日为是、为好，今日为非、为坏，明日难保不重新为是、为好；后者的种子往往正蕴涵于前者之中。真正的历史学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对这一切作全面的考察，防止作出绝对化的结论。胡适的这一弱点，也是他们这一代启蒙思想家或强或弱共有的弱点。但是，尽管如此，不能不承认，正是他所倡导的这种评判的态度和反省的精神，在哲学与哲学史、史学与史学史、文学与文学史这些前

① 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作品集》第18集，第52页。

② 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作品集》第18集，第54页。

③ 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胡适作品集》第18集，第67页。

辈启蒙学者触动较少的领域，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

二

新文化运动通过挣脱旧思想、旧观念的钳束，落足还是新文化的创造。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予以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之后，继之以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充分表明，他完全意识到思想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

在新文化的建设方面，胡适的突出贡献首先是他努力打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天朝君臣四裔来看待世界的传统观念，努力改变“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及文化排他主义，一直大声疾呼给西方文化、西方精神文明以应有的尊重，积极地了解和输入世界文化的成就，推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旧有文化的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实际地促进了新文化的形成。

显示胡适这一立场的是前后相距三十五年而又都激起了轩然大波的两篇文章，一是1926年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二是1961年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两篇文章主旨都是批驳西方代表物质文明、东方代表精神文明的流行观点。前文指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①文章对西方近代文明作了具体的剖析，说明近代西方在理智方面通过科学追求真理，在宗教道德方面，用合理的信仰推翻了迷信，用尊重人格、人权打倒了神权，18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努力取代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这一切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要求的程度超过了东方旧文明。后一篇文章重申这些论点，并更直率地宣言：“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

^①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作品集》第11集，第4页。